

戰火中的大學

從陝北公學到人民大學的回顧

成仿吾 著

序言

教育革命的道路

我們的祖先是重視教育的。可以這樣說：中華民族是最古老的重視教育的民族之一。

根據文獻資料，我們在夏、商、周三代時，就有了「校」「序」「庠」的記載，這也可以說是最早的學校吧！不過，這種「校」「序」「庠」究竟是怎樣的學校組織，各書記載並不詳細，也不統一。有的把它們說成是不同朝代的不同稱呼：「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也有的把它們當作同一朝代（周代）的各級組織：「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中國近代早期改良主義思想家鄭觀應曾對這種古代學校組織十分讚揚，他說：「學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而又教以弦誦，舒其性情，故其時博學者多、成材者眾也。比及後世學校之制廢，人各延師以課其子弟，窮民之無力者，荒嬉頹廢，目不識丁，竟罔知天地古今為何物，而蔑倫悖理之事，因之層出不窮，此皆學校不講之故也。」（《學校》）鄭觀應把古代學校說得這麼好，目的在於提倡西學，按照西方那樣辦洋學堂。至於中國古代學校，是否像他說的那樣好，還是值

得研究的。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中國在遙遠的古代就很重視教育，那時就有了「校」「序」「庠」這樣的學校組織。外國學校的出現恐怕沒有中國這樣早。所以，我們說中華民族是最古老的重視教育的民族之一，大致是可以成立的。

「校」「序」「庠」還都是一些公辦學校，學生也不會多，只是一些氏族長、奴隸主、貴族及其子弟之類的少數人，主要是模仿，重在實踐。私立學校要從春秋時代的孔夫子說起。孔夫子是第一個創設規模很大的私立學校的教育家，他的學校裏有自己講學的「堂」，有學生居住的「內」。他實行「有教無類」的方針，送一束乾肉，就可以認作弟子，他教人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據說，孔門弟子先後有三千人，高才生有顏淵等七十二人（一說七十七人）。但是，孔夫子的教育主要也是為一定的政治主張服務的，也注重實踐，他教育人們不要犯上作亂；他修《春秋》的目的就是在於正名分、寓褒貶、使亂臣賊子懼；他的弟子有很多人做了大官，取得很高的地位。

秦漢以後，選拔人才的辦法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自漢至隋為一段，自唐至明又是一段。前一階段是以選舉（即推薦）為主，間用考試；後一階段則是以考試為主，參用選舉。但是，不論選舉還是考試，都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而且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點，即都是從現有的人才中甄拔，而不是對未成的人才加以教育。就是說，忽視了學校教育。唐宋以來，各地設立書院之風雖很盛行，但也主要是為當時的科舉制度服務，側重語言文學的。

近代以來，外國資本主義侵入，我國近代資本主義也在客觀上發生和發展，科舉制度的弊病愈加暴露得明顯，因此，資產階級改良派大力倡導仿照西方資本主義各國興辦學堂，並引夏、商、周三代就有學校設置以為證。而清政府中的洋務派，也感到再拘泥科舉制度，偏重語言文學，亦遠遠不能滿足現實統治的需要，也不能同西方資本主

義國家競爭，在這樣的內外形勢下，清政府才不得不於一九〇五年正式下令停開科舉，廣辦學校。

教育是不能脫離政治的。清政府在下令停開科舉、廣辦學校的同時，仍然強調了「歷次定章，原以修身讀經為本」。因此，學校雖然開辦了，但仍多是新瓶裝舊酒，換湯不換藥。拿一八九八年創立的京師大學堂來說吧，當時的學生仍是出身於舉人、進士的京官。一九一二年，京師大學堂雖然改為北京大學，但仍然沿襲着舊傳統，不是一個研究學術的機關，而是一個謀求升官發財的階梯。學生仍然被稱為「老爺」，而監督和教員則被稱為「中堂」或「大人」。學生對教員的評價，不是看學術水平，而是看他在政府中的官階。因為老師有地位，學生畢業後才有靠山。

蔡元培是我國近代教育史上值得紀念的著名的資產階級革命家和教育家。他在辛亥革命後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時，就對舊的教育制度作了若干改革。他在一九一七年任北京大學校長後，曾對這個學校作了重大改革。他遵循「兼容並包」的方針，提倡學術研究，因而使北大出現了一個「百家爭鳴」的局面。這樣，在客觀上就為李大釗、陳獨秀這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開闢了一個活動的園地，使馬克思主義得到一個可以傳播的場所。我國許多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毛澤東、鄧中夏、高君宇、黃日葵等同志，都曾在當時的北大工作或學習。

那時的北大仍然是一所資產階級性質的大學。在那裏，不僅有李大釗、陳獨秀的影響，還有胡適派的影響，後者的影響恐怕比前者還要大些。因此，從北大出來的不僅有一些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還有更多的為當時的統治階級服務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如胡適的得意弟子傅斯年、羅家倫和段錫朋等人。

至於外國人直接辦理的教會學校，學費昂貴、招生很少，培養出

來的知識分子，雖然多數還是愛國的，但確有少數人數典忘祖成了洋奴買辦。毛澤東同志曾說：「西方資產階級需要買辦和熟習西方習慣的奴才，不得不允許中國這一類國家開辦學校和派遣留學生」（《唯心歷史觀的破產》）；「我國許多有名的學校如燕京、協和、匯文、聖約翰、金陵、東吳、之江、湘雅、華西、嶺南等，都是美國人設立的」（「友誼」，還是侵略？）。當然，這並不是說所有在這些學校上學的學生後來都成了「買辦」和「奴才」，事實上，與帝國主義者的願望相反，我們一些著名的共產黨人，有的也是在這些學校中學習過的；多數畢業生和留學生還是有愛國心的，現在成了為新中國服務的各門學科的老專家。毛澤東同志上述這段話的意思，是就帝國主義的辦學目的和願望來說的，就是說，它的教育是為它的侵略中國的政治服務的。

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即十月革命後不久，列寧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批判資產階級教育時指出：「資產階級國家愈文明，它就愈會撒謊，說學校可以不問政治而為整個社會服務。事實上，學校完全變成了資產階級統治的工具，浸透了資產階級的等級思想，它的目的是為資本家培養恭順的奴才和能幹的工人。」「我們公開聲明，學校可以脫離生活，可以脫離政治，這是撒謊騙人。」

列寧的這段批判，對舊中國也是適用的。毛澤東同志上面的那一段話，也就是這個意思。

舊中國確實有廣大的失學失業的愛國青年，他們希望從學校中求得真知灼見，具備真才實學，以便為祖國貢獻力量。但是，舊中國的那一套教育制度，理論脫離實際，所學非所用，使他們大都不能如願以償，畢業即失業，仍然找不到出路。記得少奇同志在中國人民大學開學典禮講話中，批評舊大學所學非所用的時候，曾生動地舉了魯迅先生，也舉了我的例子，因為魯迅在日本是學醫科的，我在日本是學

工科的，結果卻都成了用非所學。

總之，舊中國的教育制度是不能適應無產階級的政治需要的，是不能適應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需要的。

因此，中國共產黨建立後，就十分強調教育不能脫離政治，不能脫離生活。重視教育必須為革命的政治鬥爭服務，要為當時的革命鬥爭和生產建設（特別是在蘇區和解放區中）服務。在革命鬥爭和生產建設中發現人才，培養幹部，使千百萬的優秀人才從火熱的實際鬥爭中成長、壯大。

為革命事業服務，從革命實踐中培養幹部，這絕不是說可以取消學校教育。政治和教育，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有着各自應該包含的不同內容。一些有關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知識，一些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的理論知識和專門技能，是需要通過學校教育來專門進行傳授的。實用主義者杜威的「生活即教育」，即取消學校教育的觀點，是我們馬克思主義教育所不取法的。

因此，我們黨建立後，雖然面臨着十分緊迫而複雜的革命鬥爭，但不論是在第一、二、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或者是在全面抗戰時期，我們都十分重視學校教育，通過學校教育來培養人才，提高文化。

至於學校教育的形式，根據各個時期的不同條件，隨時都有所變化和發展。例如，一九二一年十月就在上海開辦有平民女學。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間，又開辦了上海大學（共分社會學、中文、外文三系，以社會學系最大，由瞿秋白同志任主任）。一九二四年國共合作後，我們黨又參加辦黃埔軍校，派周恩來同志去任政治部主任。一九二六年，鄧中夏、劉少奇同志在廣州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創辦勞動學院，鄧任院長，劉任教授；至於毛澤東同志等在廣州、武漢辦農民運動講習所，蘇兆徵同志等在武漢辦工人運動講習所，這更是眾所周知的事了。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由於我們黨和紅軍領導人民創造了廣大的紅色區域，因而也就有可能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教育體系。

當時，紅色區域文化教育的總方針是：「在於以共產主義的精神來教育廣大的勞苦民眾，在於使文化教育為革命戰爭與階級鬥爭服務，在於使教育與勞動聯繫起來，在於使廣大中國民眾都成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毛澤東同志論教育工作》）

紅色區域文化建設的中心任務：「是厲行全部的義務教育，是發展廣泛的社會教育，是努力掃除文盲，是創造大批領導鬥爭的高級幹部。」（同上）

根據這個總方針和中心任務，各個根據地的黨組織採取了革命措施，依靠群眾力量，創造性地建立起各種新型學校，創造了各種嶄新的教育組織形式，奠定了革命政權下的新教育制度。所有這一切，才真正是中國歷史上的教育大革命。

一九三三年，黨在瑞金成立了共產主義大學，培養黨的工作幹部。同年還成立了蘇維埃大學，設有土地、國民經濟、財政、勞動、教育、司法等班。還設立了工農紅軍大學，以培養軍事幹部。設立中央列寧師範學校，以培養教育工作幹部和學校師資。此外，還設有各種技術學校和軍事特科學校，如無線電、衛生等技術學校，工農紅軍步兵特科學校等。雖然由於戰爭環境，學校的設備簡陋，學習期限短促，但以高昂的革命精神來辦學，卻培養出為黨為人民所需要的大量的優秀革命幹部。

除上述學校教育外，根據地內還普遍實行社會教育和兒童教育。社會教育的形式是在農村中普遍設立夜校，兒童教育的形式則是在農村中普遍設立列寧小學。一九三〇年，在國統區號稱教育最發達的江蘇省，入學兒童僅佔學齡兒童的 13%；而紅色區域內，如興國縣的入學兒童，卻佔學齡兒童的 60% 以上。

說到紅色區域的革命教育，我們非常懷念無產階級的老革命家、老教育家徐特立同志。徐老和他從事的教育事業是應該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大書特書的。徐老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召開的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他和瞿秋白同志一道被任命負責教育人民委員部的工作。秋白同志為部長，徐老為副部長。但秋白同志從一九三一年夏到一九三四年初還未進入中央蘇區，所以紅色區域的教育工作，實際上由徐老負責。

徐老不僅負責教育人民委員部的領導工作，而且親自創辦師資訓練班（不久就發展成為中央列寧師範學校）。這個師資訓練班的全部教學工作由他一人承擔：一切教材、課本由他一人動手編寫，一切課程由他一人講授，一切問題由他一人負責處理。他與學生同甘共苦，自己種菜、煮飯、搖鈴、掃地、參加熬硝鹽等，甚麼都做。徐老的這種作風一直保持着，紅軍長征到陝北後，他在瓦窯堡仍舊辦列寧師範學校，從校長到炊事員，都是他一人兼任。有一次，我到師範學校去找這位徐校長，但到處找不到他，到伙房才找到了他，原來這位老校長正在幫廚給學生燒飯呢！他這種精神，真是古今中外難得的師表。

一九三一年，我從德國回來，被派到鄂豫皖根據地工作，擔任鄂豫皖省委的宣傳部部長和蘇維埃文化委員會的主席。那時，負責審查各縣的識字課本，也自己動手編寫識字課本。一九七九年，湖北省還給我送來一本當時英山縣蘇維埃文化委員會翻印的列寧小學校使用的《識字班課本》第二冊。這本書是在第一冊認識三百字的基礎上編的，共二十九課，都是密切聯繫實際的。例如：

第十二課講土地革命，課文中寫道：

風把稻吹成黃的波浪，
熱血兒在我心頭震蕩，

一片前進的呼聲把豪紳地主駭得神魂飄蕩。

同志們！

快舉起鐮刀、斧頭、大紅旗，

求我們自己的解放！

第十九課是講黨的領導，課文中寫道：

中國共產黨，

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先鋒隊，

是豪紳地主的死對頭。

我們無產階級要在共產黨領導之下，

堅決奮鬥，才能徹底解放。

課文緊密結合革命政治，同時也很重視文字練習，例如第二十三課的課文便這樣寫道：「我們不但讀書，我們還要練習寫字。字寫的好，才能寫信，做簡短文字，生活上才添許多便利。」

課文還注意了結合兒童生活的特點，例如，第二十七課便是這樣一段課文：「我在路邊放牛，路上走來一個叫花子。我怕他是白匪的偵探，向他要通行證。他沒有通行證，我把他送到鄉蘇維埃去了。」

這個識字班的課本是當時由我編審的，時光流去了將近半個世紀，今天讀來，倍感親切。從這個課本看來，可以知道，我們革命根據地的教育是緊密結合當時的革命政治鬥爭、軍事鬥爭的，是為它們服務的。

七七事變爆發後的新形勢，要求我們全民族培養出大量的政治、軍事、文教、財經、群眾運動等各方面的幹部，以適應抗戰的需要。

但是，國統區的高等教育和幹部教育，已遠遠不能適應這種需要

了。當時國統區的高等學校，已紛紛停辦。有的向西南大後方轉移，但也被弄得破爛不堪，教師不能安心教學，學生也不能安心學習。有的學校則關門大吉。例如原設在青島的很著名的山東大學，在日本強盜還未打到山東的時候，就搬了家，六七百人帶着圖書、儀器，向西南大後方轉移，一邊走一邊減員，圖書、儀器也一邊丟散，結果到四川後，人和東西幾乎丟散殆盡，辦不成學校了。山東大學如此，其他學校也有類似的情況。這樣的高等教育狀況，怎麼能適應抗戰的需要呢？國民黨也有幹部教育，辦有各種訓練班，但是除了一部分實際上由我黨人員和抗日進步人士掌握的訓練班以外，大部分國民黨辦的訓練班，在抗戰初期只為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路線服務，而在武漢失守以後，便逐步成了灌輸法西斯教育的訓練班。這是和國民黨反共反人民的政治需要相適應的。

和國民黨相反，中國共產黨從抗戰一開始，就狠抓幹部教育，以適應全面抗戰的需要。因此，在陝甘寧邊區，除設有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簡稱「抗大」）外，又設有陝北公學等培養幹部的學校。此後，各根據地也仿效這種榜樣，紛紛設立各種幹部學校（如建立各地的抗大分校，晉察冀成立有華北聯合大學等）。

中共中央十分重視這種幹部教育。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在職幹部教育的決定》中說：「幹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應該是第一位的。」又說，「『在政治方針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一切的因素』。如不把幹部教育工作看得特別重要，把它放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等地位，就要犯本末倒置的錯誤了」。

全國解放，即無產階級領導人民奪取政權以後，具備了辦好教育的各方面的優越條件，形勢也迫切需要提高教育的水平。特別是在向現代化進軍的新長征途中，需要更高水平的教育。如果不能提高教育

的水平，我們的現代化是很難實現的。例如，為了現代化，我們不僅需要大量的具有現代化科學知識的技術人才，而且也需要大量的具有現代化科學知識的經濟管理人才，而一切參加現代化建設的幹部又都必須懂得科學社會主義，懂得新時期的政治學、法律學……而所有這一切，沒有高水平的教育，都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我們一切教育工作者，不管是從老解放區來的，或者是從原國統區來的，或者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才成長起來的，都不能驕傲自滿、故步自封，而需要不斷地解放思想，開動腦筋，適應新情況，研究新問題，探索新道路。將來實現共產主義，更需要高水平的科學技術，也更需要高水平的教育。因此，思想要不斷解放，教育才能不斷提高。思想解放沒有止境，隨着社會的不斷發展，教育的提高也是沒有止境的。一切教育工作者都應該毫無保留地貢獻出自己畢生的精力。



高高飄揚的陝北公學校旗

奉中央指示，我從抗戰開始就在延安創辦陝北公學，後又在晉察冀邊區辦華北聯合大學，以至解放戰爭期間的華北大學和新中國成立後的中國人民大學。時間已經流逝四十多個年頭。孔夫子辦學，弟子號稱三千；我們四十多年來培養的幹部何止三萬、十萬？現在，許多老同學已分佈在全國各個地區和各個部門，不少人已成為國家的棟樑。無論在戰爭時期或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同學中出現過不少烈士，這些同學雖然早已不在人間，但他們的可歌可泣的事跡，卻永遠激勵着我們這些幸存者前進！

中國人民大學建校已屆三十周年，復校也已兩年多（中國人民大學於1978年復校——編者）。撫今追昔，我回憶起從陝北公學以來我們在戰火中辦大學的艱苦的年代，回憶起在戰鬥年代，在艱苦的鬥爭中，我們的同事和同學中那些英勇地獻出了寶貴生命的英烈。每每回憶起這些死難烈士來，他們的音容笑貌還宛然如昨，常使我激動緬懷。我深感有責任把我們在戰火中辦大學的事跡記述下來。我現在把這些戰爭年代的往事（從陝北公學、華北聯合大學到華北大學）作一個梗概的回憶（這個回憶，由我口述，由胡華、彭明、劉煉三位同志筆錄整理），其目的也就是為了發揚老解放區教育的光榮傳統，繼往開來，為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而辦好教育，為進一步辦好中國人民大學而提供一個教育史、校史的史料。

人類的發展，首先依賴於宇宙的存在與發展，而這需要無數的世紀。人類社會的教育也同樣需要漫長的世紀供它發展。各民族教育的歷史發展，首先都經歷了漫長的模仿的階段，這一階段幾乎同人類的歷史發展一般源遠流長。有的落後地區，經過奴隸社會，甚至封建社會，還保留着模仿的實質。在中國，語言文學的模仿經歷了許多朝代，其他知識的教育都是很落後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現代化教育實行了幾百年還很少普及，許多地區文盲才剛開始消滅。當



成仿吾與胡華（右一）、彭明（左二）、劉煉（左三）、陳光（左一）討論《戰火中的大學》書稿



成仿吾在給學生代表講《戰火中的大學》中的故事

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文盲是不能完全消滅的。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很大一部分經過了中世紀漫長的黑暗時代，實現了教育的資本主義現代化，有些已經逐漸「老化」了，像它們在政治與經濟上早已老化一樣。我們由於封建時期特別長，也由於帝國主義侵略割據，所以我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不能是單純民主民族的，一般資本主義的，而是新民主主義的，包含有社會主義的內容，即使得它不能只是一般資本主義的，而不能不迅速過渡到更高的階段，即社會主義。在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初期，我們甚至實現了戰時共產主義。

西方資產階級，在它僅僅幾百年的統治時期作出了前人很難想像的巨大的物質成就，但它唯利是圖，目光如豆，在精神方面倒退了不止一步，它實現的教育的資本主義現代化僅僅滿足了它剝削的需要，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成仿吾在《戰火中的大學》上為學生題字

對人的要求只是以滿足資本的眼前利益為限，別的東西不在它考慮的範圍內。這連各種霸權主義也不例外，因為它本質是離不開資本主義的，雖然戴着各種各樣的假面具。

我們從新的民主革命開始，就走了另外的道路，我們的方針是德智體全面發展，這一方針貫穿在教育工作的各個方面，是教育工作的準繩。我們可以把教育工作理解為在德育、智育與體育方面全面發展，使受教育者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這樣的教育顯然不能是資產階級的，而只能是無產階級的。它只能是為培養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的新人服務的。

目 錄

序 言	教育革命的道路	001
第一章	陝北公學	017
	一、為挽救民族危亡，開展抗戰教育	018
	二、創建陝北公學	024
	三、革命的政治教育	036
	四、民眾運動和政府工作教育	045
	五、軍事教育	048
	六、勞動教育	053
	七、陝北公學分校	056
	八、陝北公學女生隊	065
	九、校風——忠誠、團結、緊張、活潑	069
	十、陝北公學學生會	073
	十一、陝北公學流動劇團	079
	十二、陝北公學辦學過程中的鬥爭	086
	十三、畢業上前線	089
第二章	華北聯合大學（抗日戰爭時期）	095
	一、從柘邑到延安	096
	二、黨中央、毛主席歡送我們上前線	098
	三、東渡黃河	104

四、翻越呂梁山、雲中山	108
五、突破敵人一層層的封鎖線	110
六、華北聯合大學的旗幟插在敵人的心臟上	115
七、在敵後開學和第一次參加反「掃蕩」戰鬥	122
八、晉察冀邊區的最高學府	131
九、華北聯合大學的擴展	138
十、一九四一年秋季反「掃蕩」的浴血苦戰	142
十一、渡過最困難的一九四二年	146
十二、喋血敵後戰場，迎接抗戰勝利	151
第三章 華北聯合大學（解放戰爭時期）	159
一、張家口階段，復校和走向正規化	160
二、從張家口到束鹿，八百里小長征，重返農村	173
三、從束鹿到正定，向石家莊工人階級學習	183
第四章 從華北大學到中國人民大學	191
一、華北大學的成立	192
二、華北大學各部情況及課程設置	200
三、從正定到北平	209
四、中國人民大學的創辦	215

第一章

陝北公學

一、為挽救民族危亡，開展抗戰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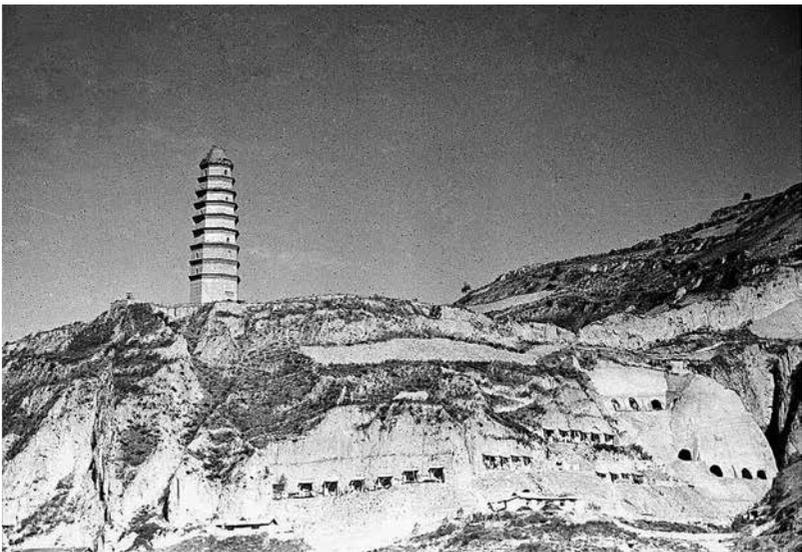
陝北公學是中共中央直接領導創辦的第一所革命的大學，是在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形勢下，為滿足全面的全民族抗日戰爭的需要，堅持國防教育培養萬千謀求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幹部而創辦的大學。一九三七年八月成立於延安。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日本帝國主義悍然把侵略戰火由關外燃燒到華北，燃燒到全中國，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日本侵略者瘋狂地強佔我國土，掠劫我財富，殘殺我同胞，妄圖用野蠻的暴力征服中國，把整個中國變為它獨佔的殖民地。日本法西斯強盜不僅要奴役我中華民族，而且也要用一切野蠻手段毀滅我文化。在北平這座文化古城裏，高等學府變成了日寇的兵營，古代文物被劫掠，歷史文獻被焚毀，清華、燕京等大學被轟炸，成千上萬青年被迫失學。日本侵略者轟炸天津尤為殘酷，北方最高學府之一天津的南開大學，在日本法西斯的炮火下，轉瞬間化為焦土。上海、江浙一帶的文化機關、高等學校都成為日機轟炸的目標。遷到長沙的清華大學也未能逃脫被炸的命運。山東的大、中、小學和文化機關也相繼被摧毀，山東大學被迫西遷，一路上人員四散，圖書、儀器毀棄殆盡。五千年悠久歷史的中華民族面臨着嚴重的民族危機和空前的文化浩劫。

中華民族不甘被奴役，中國的優秀青年更不能坐視祖國和父兄姊妹

受此凌辱。早在七七事變前，他們就奮然前行，投身於抗日救亡鬥爭，掀起偉大的「一二·九」運動，但是被節節退讓實行不抵抗主義的國民黨當局鎮壓了。學生組織南下工作團，要求南京政府抗日，又中途受阻，被押回平津。「一二·九」運動中的先進青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組織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在華北各地進行抗日救亡工作，但是國民黨也不容許它合法存在，到處勒令解散。直至七七事變，人民的抗日愛國運動仍然受到國民黨政府的百般阻撓和限制。

大批失學失業的青年從敵佔區逃出來，過着流亡的生活，在急切地尋找着抗日救亡的道路，尋找着抗日救國的真理，但是，在國統區卻是抗日有罪，愛國無門，到哪裏去呢？到前線去吧，到後方去吧！這時，中國的西北方、陝北高原上矗立起一座燈塔，照亮了抗日救國的航道，強烈地吸引着全國的愛國青年。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長征到陝



一九四四年延安寶塔山（〔美〕福爾曼攝，照片來源：延安大學）

北後建立起來的陝甘寧抗日根據地的首府，全國最民主最先進的政治中心——延安。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到陝北後，立刻高舉民族解放的旗幟，一面領導和發動了偉大的「一二·九」運動，推動了全國的抗日救亡運動；一面東渡黃河，奔赴抗日戰場。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願同一切抗日武裝合作，共同抗日。首先紅軍在西北同東北軍、十七路軍達成聯合抗日的協定，接着又和平解決了西安事變，迫使蔣介石同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這樣，才出現了全國抗戰的局面。

全國抗戰的局面雖然出現了，但是國民黨政府毫無全面抗戰的準備。只有中國共產黨積極地進行抗戰的準備工作。當時，毛澤東同志指出：「中國的救亡抗戰，必須用跑步的速度去準備。」（《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準備，就是抗戰幹部的準備。在這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中國共產黨必須挺身而出，擔負起領導民族解放戰爭的歷史重任。黨的組織必須迅速向全國發展，就要求以最短的時間、最快的速度培養大批革命幹部去做喚起民眾、組織民眾、武裝民眾參加抗戰的工作，以適應全國抗戰的迫切需要。

民族危機和抗日戰爭要求迅速開展革命的國防教育。西安事變後，毛澤東同志就高瞻遠矚地提出重視教育和培養大批幹部的任務。一九三七年五月，黨的全國代表會議規定了要加強紅軍的軍事政治文化教育，要實行必要的文化建設。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制定了「教育為長期戰爭服務」的方針，並作出了「創設並擴大增強各種幹部學校，培養大批的抗日幹部」的決議。因此，黨中央在陝甘寧邊區先後成立了各種類型的學校。除去紅軍大學改為抗日軍政大學外，陸續創辦了陝北公學、安吳堡戰時青年訓練班、延安工人學校、魯迅藝術學院、中國女子大學和馬列學院；此後，還成立了社會科學院、自然科學院、

行政學院（後三院合併為延安大學）；還有魯迅師範、衛生學校、通訊學校、摩托學校等等。培養軍事、政治、文化藝術、科學工程、醫務衛生、社會科學理論、青年婦女工作等各方面的幹部。這些學校按照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規定的國防教育的方針辦學，即教育為長期抗戰服務，根本改革舊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實行革命理論和革命實際結合、教育與政治結合的原則。陝甘寧邊區是全國最先進的地區，它的教育事業很快吸引了全國各地的進步青年。

一九三五年，我隨中央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達陝北。中央機關先是在瓦窯堡和定邊一帶。我當時在中央黨校工作，是黨校的教育主任。黨校先駐在保安及長城腳下的定邊。西安事變後，張學良將軍把東北軍撤至西安以便對付何應欽的進犯，而把延安留給我們。一九三七年一月，毛主席率黨中央機關遷到延安。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中央黨校由定邊搬到延安橋兒溝天主教堂。從此，延安就成為抗日戰爭和中國革命的新的燈塔。



一九三六年成仿吾在保安（〔美〕斯諾攝）



革命青年奔赴延安（一）



革命青年奔赴延安（二）

這時全國各地進步青年正在迫切地尋找抗日救亡的道路。這些年來，他們清楚地看到國共兩黨對待抗日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逐步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真正能夠領導抗日的政黨，把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希望寄託在我們黨身上。於是許多愛國青年辭別父母、離鄉背井，千里跋涉，突破敵人的封鎖，紛紛奔向延安，他們中大部分是青年學生，也有少數工人、職員和公務人員，還有從南洋、日本、歐美回到祖國參加抗日救亡工作的華僑青年。華北各地的民族解放先鋒隊隊員也成群結隊地到延安來。這時，「到陝北去」，「到延安去」，成為進步青年要求參加抗日、參加革命的共同願望。

在這種形勢下，一九三七年初，黨中央、毛主席指示紅軍大學改為抗日軍政大學，對廣大革命青年開門，設立第四大隊，專門招收由國統區和敵佔區進來的大、中學生。

黨中央十分重視第四大隊的教育工作，特地調中央黨校校長董必武同志來擔任第四大隊的政委；又從第一、二大隊中抽調一些老紅軍、老幹部擔任第四大隊各隊的隊長。第四大隊先後成立六個隊，大隊長兼九隊隊長是聶鶴亭同志，他是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的畢業生，後來調出去做過彭德懷同志的指揮部的副參謀長。各隊隊長有邊章五同志，是十隊隊長，一九二三年保定軍校畢業，後擔任延安城防司令；有何長工同志，是十一隊隊長；此外還有劉忠、謝翰文、文年生、譚家述等同志，領導幹部的陣容是相當強的。另外還從第二大隊調來季凱同志（上海產業工人）給董必武同志當政治幹事，兼第四大隊的分總支書記。當時在第四大隊學習的學員有黃華、周榮鑫等同志，現在人民大學的副校長孫力餘同志也在第四大隊學習過。

第四大隊的教員就由紅軍大學和中央黨校的教員兼任，毛主席和博古同志在第四大隊講過「辯證法」和「中國革命史」，這是最受歡迎的兩門課。

第四大隊的學員經過短期訓練，於一九三七年六、七月相繼結業，多數學生分配到八路軍各師，走上抗日前線，少數同志留在延安和邊區工作。其中有五六十名新黨員分配到中央黨校來繼續學習，由我負責組織安排他們的學習和工作。首先安排他們下鄉鍛煉，接觸社會實際。我主要做了兩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對這些學員說，革命知識分子要和工農結合，要了解邊區的實際狀況，下鄉後不要看不起沒有文化知識的農民，在政治覺悟上你們還不如這些老蘇區的農民，要積極參加勞動和農村工作，自覺鍛煉自己。另一方面召集有關鄉支部書記開會，向他們介紹這些學員的情況，說這些同志是從大城市來邊區不久的知識分子，他們文化水平高，有革命熱情，但政治水平不高，對邊區實際鬥爭了解很少，到農村來實習和鍛煉，村幹部要教育農民愛護他們，幫助他們，不要看不起他們。這樣，兩方面合作得很好。經過一個多月的鍛煉，一九三七年七、八月間，他們就回黨校來學習馬列主義和黨的知識等課程。這些大城市來的知識青年上這一課是十分必要的。

二、創建陝北公學

七七事變爆發後，由於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形勢比較好，到延安來求學的知識青年日益增多。在抗日軍政大學中辦培訓大隊已經不能適應抗戰形勢發展的需要了。黨要向全國發展，八路軍要迅速壯大，以實現全面的全民族抗戰，就必須培養大批抗戰幹部。於是，一九三七年七月底，黨中央決定成立陝北公學，委託林伯渠、吳玉章、董必武、徐特立、張雲逸等幾位熱心教育事業的老同志和我一起負責

籌備創建陝北公學的工作。

在全國各地學校紛紛關門、遷校、逃散的時候，我們卻在延安迎着敵人飛機的轟炸，大辦抗戰教育，創建陝北公學，挽救中國教育的危機。我們陝北公學的成立，是抗戰的教育，也是教育上的抗戰。

黨中央調我擔任陝北公學的校長，並指定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陝北公學籌備委員會委員
林伯渠



陝北公學籌備委員會委員
吳玉章



陝北公學籌備委員會委員
董必武



陝北公學籌備委員會委員
徐特立



陝北公學籌備委員會委員
張雲逸



陝北公學籌備委員會委員、陝北公學校長成仿吾